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回應王國斌

Response to R. Bin Wong

doi:10.6752/JCS.201409_(19).0006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 : 鐘月岑(Yuehtsen Juliette Chung)

頁數/Page : 64-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回應

《文化研究》第十九期（2014年秋季）：64-67

回應王國斌*

Response to R. Bin Wong

鐘月岑**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元鴻老師的評論較長，就由我先開頭評論。我的評論裡頭有些比較精短、簡要的摘要，幫助在場與會的朋友們了解一下王國斌老師的演講梗概。（我今天的評論會先講英文再翻中文，讓口譯的朋友休息一下，也讓我們安靜的思考一下王國斌老師帶來的議題）。

王國斌老師的研究花了二十幾年的工夫，基本上跟西方的世界史研究或經濟史研究對話。過去在漢學或中國研究的領域裡頭，基本面對的問題意識都是說明中國是怎麼樣子或中國不是怎麼樣子的議題，總是在這種提問的問題意識上擺盪。今天王國斌老師已經很具說服力地告訴我們中國是這樣子、不是這樣子或歐洲是這樣子、中國不是這樣子。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到中國的路徑，他今天現場演講跟手邊拿到的手冊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特別指出來的一path-dependent，就是說那個路徑所走出來的中國的路或歷史的這條路裡面，其中具備的歷史的條件，跟歐洲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很重要是顯示中國並不是一個跟在歐洲後面亦步亦趨地模仿學習，或者是停滯不前，或者是學習的不好，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是功成事就的歐洲的雙胞胎但卻是癱腳的兄弟。王國斌老師這二十幾年來的研究成果把這樣一個形象慢慢地去除了。

* 編者註：鐘月岑教授主要回應王國斌教授於清華大學的演講，亦即本專題論文之第一節。

** 鐘月岑，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電子信箱：juliette.chung@gmail.com

今天的演講，如果我沒有過當地去解釋它的話，我覺得後來的演講裡頭，大概是朱元鴻老師的評論大綱的提醒緣故罷，他特別區分他跟John Lagerwey的關係。但事實上，在王老師的文章裡頭，我覺得他跟John Lagerwey的描述是很像的，中國的State—政府、中央或朝廷，基本上很像天主教教廷所具有的對等的功能，可以說是具有道家思想或意識的教廷。所以這個平行對等，基本上在中世紀，不管在歐洲或中國是很像的。這個政教的分離、這個聖凡之間的分裂是來自early modern，從十一世紀便開始呈現的一種早期現代性的意識，從歐洲後來才慢慢地傳播到其他世界的地區，這是透過殖民、貿易等很多途徑傳播出去的。相對而言，十一世紀的中國並沒有像天主教教廷對地方的控制那麼森嚴，中國對地方宗教的影響是比較鬆散的，而天主教透過正統的界定、消滅異端或是在法律上土地繼承的管理來鞏固它的宗教權威。從十一世紀以來的這一千年當中，中國的情況是透過官僚體制對地方的控制而慢慢地顯現出來，中央對地方的集權干預並沒有遭遇到堅忍不摧的抵抗，或造成大規模的抵抗以至於演變成鼓勵國家與社會對槓拉扯的狀況。在中古的歐洲，或是早期近代時段，歐洲的國家跟教廷的政教分離，是宗教信仰慢慢地成爲個人事務的現實而逐漸對基督教義不同詮釋掌握，漸漸分歧而變成不同群體的信仰者或信仰社群，雖然天主教廷極力透過正統教義的界定來維持權威，但是教廷對週遭地方的王族諸侯的控制逐漸衰微。後來，民族主義的風潮帶動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使得打造國家成爲不斷爭取世俗的威權的政治運動。

在此過程中，王國斌老師一直在強調的是，由於中古歐洲在十一、二世紀，各個小的國家慢慢形成，需要很多法律的規定來協調當地的秩序，這種多重性的現實需要使得法律成爲必然的超越或者是獨一無二法律，亦即所謂的canonical law，教廷掌握並整合這些多重的法律系統而形成的canonical law，在此之下，各國君主據此來治理地方，使得它成爲凡間政治上的準則，以及國與國之間互動的模式，如此凡間的秩序能夠穩定下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最近這幾個世紀以來，這個過程透過貿易和殖民傳播到世界許多角落。

但是中國並沒有經歷這樣的過程，我們目前的共識是：在西方，法律是在個人、在政權之上；但在中國的情狀下，法令是隨著政治或朝代嬗替的政權左右擺盪的，或是說誰來當政，誰就可以決定法律，所以在中國，政府的力量可以隨著朝代的變化消長，或者跟著皇帝個人的能力成就來起伏。縱然如此，以政治的力量來賜封民間信仰的神靈、地方特有的神祇或者是加以賜額、封號，藉此這種力量來界定正統教義和權威駕馭宗教，並進而增加神祇的威望或顯靈的效驗的作為從來沒有被挑戰過。除了一些會黨教派造反叛變的例子之外，在道教教義論述中的天廷，所謂的celestial bureaucracy，不只是跟人間的政治力量互為類比，並而且支撐了人間朝廷的想像，所以理所當然地被政治菁英接受，也不會被推翻的。透過士紳們儒教融合的儀式化，這種政治的力量來操作地方宗教的作為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這裡頭士紳、學者及獲取功名的政治菁英基本上扮演著雙面的角色，他們在國家和地方社會之間調和鼎鼐，這群士紳、學者及獲取功名的政治菁英事實上不只沒有把國家和地方社會拆開來，反而是把他們融合為一個同心圓式的整體。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比較能理解星雲大師為什麼到北京接受終身成就獎，然後從大陸政治的角度去看，他之所以會被接受是因為他「一個中國」的統一立場，受到北京政府的背書，或說星雲大師跟傳統的社會菁英一樣調和鼎鼐，而北京政府跟歷來的朝代政權一樣介入宗教場域。這其中包含了宗教、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的多重整合的意義。

歐洲有政教的分離，然後宗教的自主性並沒有存在於公民社會裡頭，我要問的問題是，中國目前的崛起是什麼樣的現象？是像漢唐那樣的崛起？還是清朝那樣的崛起？中國人民共和國在五〇年代的四反四清運動，接著文化大革命的過程裡頭，把道教打入迷信的胡同裡。在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裡，我們今天看到的共產黨事實上是一個新興的宗教，它的信仰系統是在最世俗的事業中建構起來的，不曉得王國斌老師是怎樣去看這個歷史現象，我們都是學院裡頭的歷史家，今天的中國社會裡頭，在毛後或改革後的社會狀況裡頭，我們看到道教和佛教因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重新的崛起或活躍，我們也觀察到梵蒂岡

教廷想要擴張它的宗教勢力，想要在中國爭取更多天主教的信徒。宗教勢力在中國的競爭和角逐下能不能幫助中國建構公民社會裡頭另一股力量？而且這股力量不一定要經過西方式的世俗政治和宗教的分離。或者說我們今天看到慈濟在全世界NGO的救援行動，事實上比任何一個政府還更具政治效率，這種力量要怎麼樣去了解？我們今日面對的現實是政治比宗教更宗教，而宗教比政治更政治！

另外，我提出來兩個問題有關於王老師的研究，跟兩個領域的對話。第一個對話是，中國和歐洲的比較，王老師這種跨區域的研究，是不是足夠或取代我們之前了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而成爲新的研究教學領域？爲什麼我們需要了解這樣新的領域呢？在學術上這樣的對話，我想多聽聽王老師的立場。另外，國家與地域社會的研究在漢學或中國研究領域中行之有年，也累積很多豐富的成果。王國斌老師對於他之前的同事Philip Huang（黃宗智）、Mary Rankin（冉玫鑠）、William Rowe（羅威廉）等等對於國家跟地方社會之間的位置是有區分的，但是這個位置跟今天王老師所說的沒有分離是很不一樣的，他們之間有不同程度的差異，甚至和溝口雄三分析公跟私這部份的研究成果也有分別，不曉得王老師會是怎樣跟他對話的？以上，我覺得可以增加大家討論，還有希望能夠拋磚引玉，激發多一點討論甚至辯論的空間！